

板本學

古籍工作重實踐，著述為人指迷津 --讀姚伯岳著《惜古拂塵錄》後的一些補充

郭明芳*

姚伯岳先生文集《惜古拂塵錄》（北京市：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6月）近日出版面世。此書是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規劃的「公書林」學術叢書系列之一，亦是先生繼《燕北書城困學錄》（長沙：嶽麓書社，2010年）後，第二部之論文集結，收錄先生近十年撰作論文約廿二篇。

《惜古拂塵錄》一書共分四卷，卷一「學人與書」，收論文凡七篇，主要談重要學者與圖書關係考訂，諸如黃丕烈、王重民與北京大學學人藏書與事蹟等。姚先生的碩士論文即以黃丕烈為研究對象，其後又出版《黃丕烈評傳》，沈津對此書評價頗高。而綜觀兩岸三地的黃丕烈相關研究仍未超越姚氏《評傳》。本書所收有關黃丕烈文章正是姚先生持續研究的成果，亦可見姚先生的研究精神。卷二「圖書館館史與館藏」，凡四篇，談北京大學與美國華盛頓大學藏書歷史。近年來，中國大陸隨著經濟力量強大，開始注意到文化層次，尤其對海外藏漢籍的整理與發掘，尤有表現。例如說山東大學國際漢學研究中心即著手整理大陸以外國家地區漢籍與整理回歸工作。伯岳先生曾奉派至北美的美加兩國，協助整理古籍，是卷所收即是先生在華盛頓大學藏漢籍的歷史，並得讓吾人得窺海外館藏情形。卷三「版本鑑定與古籍編目」，凡六篇，談其實際從事古籍整理與版本鑑定所遇問題，以及主持「學苑汲古」數據庫、美國華盛頓大學與加拿大哥哥倫比亞大學古籍整理工作報告。卷四「傳統與現代」，凡五篇，包括書評兩篇，以及姚氏在古籍保護方面的想法。

姚伯岳（1963-），內蒙古自治區人。1986年北京大學圖書館系碩士，姚氏碩士論文即以黃丕烈版本目錄學為主題，其後又在此基礎上撰有《黃丕烈評傳》（收入南京大學《中國歷代思想家評傳》之一）一書，其對黃丕烈研究與評價可說深入且公允。碩士畢業後進入北京大學圖書館系任教，1999年方調入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部工作。期間，他曾赴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華盛頓大學與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進行

* 東吳大學中文博士

學術訪問，從事古籍版本鑑定與研究。至 2018 年以傑出人才聘入天津師範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並任該院常務副院長。姚氏長年從事古籍整理與古籍版本鑑定，著有《版本學》、《中國圖書版本學》（《版本學》的增訂本）、《黃丕烈評傳》、《燕北書城困學錄》等書與相關學術論文六十餘篇。

本書四卷，其卷三談古籍鑑定與編目諸問題是筆者所特別注意到的部分。這部分不僅是姚氏從事古籍版本鑑定經驗之談，也可提供實際整理館藏編目人員參考。沈津曾言從事古籍版本編目或鑑定工作乃是經驗積累而成，並非靠著幾本概論書籍就可達陣。姚氏曾著《版本學》（後增訂為《中國圖書版本學》），是書內容包羅古今，說解可謂詳盡。然此類概論書籍，多不能針對個案一一剖析，此非戰之罪。筆者碩士班修習「版本學研究」，老師即以此書為教科書講授，奠定基礎。姚氏進入圖書館工作，實際從事古籍整理與編目，在經驗積累之餘，足能在版本學領域內有所增長，且撰為文字，指點後進迷津。姚氏在本書〈後記〉言：

過去十年，是我在北大圖書館從事館藏未編書編目工作最繁忙的十年，也是我作為古籍編目總校對古籍編目工作思考最多的一段時期。這其實很正常，見得多，自然收穫多，也就會想得多。本書中所收的〈古籍版本鑑別和著錄中的內封、牌記依據問題〉、〈活字本鑑別與著錄得幾個問題及思考〉、〈圖書館古籍編目中廣州刻書的版本著錄問題〉等文章，就是這種實踐與思考的結果。幾篇文章都不短，但列出的參考文獻很少，因為所講的都是自己在編目中遇見的古籍和發現的問題，沒有其他文獻可參考。…（頁 293）

姚氏文集卷三可說是先生在實踐中所記下的寶貴經驗。這不僅是姚氏細心之處，能發掘問題並提出合理解釋，也是提供古籍整理者整理古籍之參考。這種經驗難能可貴，蓋未實際從事古籍整理者，不可能發掘如此寶貴經驗；而實際從事古籍整理若無用心也無法體會。這種經驗很多時候足以改變對一書版本的認定，甚至改寫中國出版史。但能有所體會又能發文為後人指點迷津者，其功莫大。這部分筆者並結合自身經驗，分為三部分說明。

其一，對於古籍扉頁（大陸學者或稱「內封」）或牌記，常常成為鑑定版本重要根據。但姚氏認為古籍扉頁或牌記不可遽信，尤其是書籍的後

印本或翻刻本。面對這種情況，實際編目必須查核各館所藏同書書影，一一比對，再從書內外各種蛛絲馬跡，求得真正刊印時地。姚氏在文章中舉不少例子，並且圖文並茂說解。這都歸功於姚氏在北大工作的積累，以及大力推動「學苑汲古」數據庫，以作為版本鑑定資造庫的成果。

然姚氏此論，筆者不得不另外再增加幾種可能性。筆者曾撰〈耦園主人陸錦刻李義山詩、文集考辨--兼談某某藏版非真某某藏版之例〉（《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7 期，2016 年 7 月，頁 60-66）一文，就所見到《李義山詩、文集》牌記進行考辨，認為現存乾隆所刊行者應是耦園主人陸錦所刻，並非牌記所記之姚氏花溪草堂或松桂堂藏版。

而同書有不同牌記亦是姚老師要我們特別注意。他有時牽涉翻刻或後印。筆者再補充一種情況，即筆者撰〈從東海館藏原富談是書初印、後印與翻刻--兼談是書著錄上相關問題〉（《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34 期，頁 58-64，2018 年 10 月）討論清末翻譯家嚴復翻譯《原富》與所見刊行情形。此書原為上海商務印書館鉛排石印本，後經書坊翻刻，其牌記仿刻商務印書館牌記，在著錄時應注意是否有石印或刻本特徵。

筆者另外補充一種狀況，即書坊與民人合作的例子。筆者曾見兩種明刊同版的《王文恪公集》，一種扉頁有「本衙藏版」，另一種則無任何藏版字（此本見臺灣師大所藏）。兩書斷版處同，刷印時間相差不久。筆者推測此書應該是王家與書坊合作刊印之書，有「本衙」者為書坊取之販售之本，無者為王家自藏或餽贈之本。當然這牽涉到中國出版史相關課題。

附帶一題，私人委託書坊刊印的情形，如果確知又應當如何著錄？舉例如清末南京狀元閣為南京大肆，其自刊有圖書，也為友人刊印文集或代人排印家譜。依筆者統計，該肆共刊印超過三百種圖書。狀元閣曾代友人李宗媚求要堂刊印《古文辭類纂》，其牌記作「光緒辛丑春滁州李氏求要堂校槧」。一般均作此著錄。而此書又見狀元閣《價目》（出版目錄），若依照牌記作「光緒廿六年李氏求要堂刊本」，則又不符實際狀況。以筆者粗淺認知，或者著錄「光緒廿六年滁州李宗媚求要堂委金陵狀元閣刊本」。

其二，據活字本翻刻的書籍鑑定問題。活字印刷在清代有不少紀錄，乾隆間武英殿聚珍版尤為著名，至於民間，木活字應用更廣，舉凡文集排印，到家譜的排印，屢見不鮮。但以活字印本為底本另行雕版刷印的版本，

有時被當成活字本著錄，尤其是清中葉琉璃廠半坡居士排印的南明史料數種最多。姚氏注意到這種情況，但姚氏認為據活字翻刻的書是因為活字排印，印後即拆，若再印需再次排字，頗為不便（頁 183）。但事實上，筆者不贊同此說。

筆者曾撰〈臺灣外記癸巳本刊印時間新考〉（《古典文獻研究》第 19 輯上卷，頁 237-266，2016 年 12 月），除分析《臺灣外記》版刻流傳外，對於活字本是否整版保存亦有涉獵。筆者在文章中提到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臺灣外記》卅卷木活字印本有前、後印本，印本甲有倒字三，至印本乙則僅剩一。這正可說明前後印本間並未拆版。其次，《臺灣外記》初刊於道光間，為十卷本。至光緒初始有《申報》館重編訂為卅卷本，以鉛字印行。其後又有卅卷本木活字印本出現，在木活字本後又見有翻刻本。翻刻本現僅出現在臺灣公私藏家，大陸似未見。這樣的例子，筆者以為乃是在活字不發達地區仍以刻板翻刻之故。這樣的例子在著錄上仍應多方查察。

其三，關於廣東官府與書坊合作（委託）刊書問題。姚氏注意到清代廣東地區刻書，由官府出資委託民間刻梓，於著錄應如何處理？例如說筆者曾經眼道光十三（1833）年兩廣總督署刊朱墨套印本紀昀編《史通削繁》數種即是一例。此書其中一部牌記作「道光十三年冬刊於兩廣節署，粵東雙門底芸香堂承刊」；另有一部牌記則作「道光十三年冬刊於兩廣節署」無承刊書坊字，另扉頁有紅章：「雙門底下弁山樓發兌」。筆者認為前一部為歸廣東官府刊本，後一種則為書坊刷印販售之本。此書後版歸瀚墨園，又有刷印。此一書的刷印至少有三種狀況，要如何著錄？這不僅牽涉到官府委託民間刻書問題，而且牽涉到所謂官書販售問題。

筆者曾注意到明代書坊與民人合作（委託）刊書問題，撰有〈籌海圖編在明末清初流傳研究--兼談版本學上本衙藏版為坊私合作可能性〉（《古文獻整理與研究》第 2 輯，頁 87-118，2017 年 8 月）討論，同時也注意到清代地方志扉頁有「本衙」問題是否也是官府委託書坊刊行，另撰有〈談清代地方志中的本衙藏版問題〉（《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22 期，頁 14-22，2017 年 10 月）。蓋古代出版耗資甚多，或在出版業不發達地區，或官府無法招募足量刻工，或民間刊書工價便宜等情況，會有合作刊書產生。

因此，官府與民間出版業合作刊印書籍，待書成後，官府可取若干圖書，書坊亦可分得若干以銷售，各取其利。而官府所取之書，應無任何書坊註記，如書坊地址、書價等，反之，若是書坊販售者，則有之。

民人或官府均有與書坊合作刊行書籍例子，也是中國出版史重要課題之一，也顯示出版業的多角經營。當然也有單純為官府刻書，無取之以販售的例子，例如說清光緒初臺灣府刊印《全臺輿圖》，即委之廣東富文齋，書刻成後，海運回臺，版存府學庫，如需刷印再委託台郡松雲軒。

而這類書籍在著錄上，筆者認為仍應以刻印主角為主敘述，例如說如是官府委託，應著錄「某某官府刻本」，並加註委託某坊刊印；如是官府委託但為書坊刷印販售，或許可以著錄「某某官府刊、某某書坊印本」，諸如此類。

筆者在讀姚氏《惜古拂塵錄》後，對於姚老師能夠將自身整理古籍的經驗寫作文章，不僅是總結自己經驗，也是有益於後來的古籍整理者。若有古籍整理者在整理館藏遇到同樣問題，即可據之著錄，而不必依照舊錄，以訛傳訛下去。這類文章值得多多發表，縱算「敝帚」也不用「自珍」。這是促進古籍整理或中國出版史向前進步的最大功臣。

